



民间文化学系列教材

解释民俗学

林继富 王丹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解 释 民 俗 学

林继富 王 丹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 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民俗学/林继富,王丹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

ISBN 7-5622-3403-5

I. 解… II. ①林… ②王… III. 民俗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042 号

解释民俗学

林继富 王 丹 著 ©

责任编辑:谢 琴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五编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绪论 时代呼唤民俗学

以研究民众生活为己任的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一个世纪,但是民俗学的学科内容——民俗,则具有久远的历史。如果说华夏子民诞生在地球上就出现了民俗的话,那么,在这块土地上,老百姓为了更好地生活,他们在惯例的左右下辛勤地耕耘和劳作;为了和谐、和睦相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规约生活行为和社会运转的制度;为了自由闲适地倾吐声音、抒发情感,他们不断创造着“言为心声”、“我口唱我心”的文学。这些传承于历史长河,源自于每个社会时段,发生于不同族群的民间知识汇聚成厚实、博大、严密的中华文化而光耀四射,并以其独特的功能和不朽的魅力引导着文化的创制和发展,调适着民众的生活秩序和精神世界。它们的久远、它们的鲜活,它们的广博、它们的精深,它们自由飞腾的思想、它们承传延续的结构范式,体现了炎黄子孙对生命的不懈追求和对艺术的无限创造力。这些悠悠古韵与勃勃生机交织而成的民众知识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今快速变迁的世界格局中,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发展经济和谋求进步,各国政府正在加快速度与世界同步;为了表现各自的民族个性和文化魅力,他们又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地球村里,各国政府和民众正在积极行动,他们实施的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措和举动维护了民族的根脉,唱响了民族的声音,确证了民族的身份,并以其鲜明的民族品格影响着世界。在这样一个重视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大力加强中国民俗学的建设颇为重要,也十分紧迫!

一、国际化的学科

民俗学是一门具有很强国际性的学科。它诞生于欧洲,后来逐步走向世界,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1846年,威廉·汤姆斯提出“folklore”一词之前,欧洲民俗学就已经出现。19世纪初期,处于拿破仑统治下的德国,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日渐式微。为了寻找民族的传统,唤醒民族意识和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力,当时德国

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学者大力提倡复制“祖国的古董”、挖掘“民间精神”。在这种政治形势和文化背景下,格林兄弟开始搜集民间故事,希望从民间故事里找到德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他们经过几年的搜集和加工,于1812年出版了《儿童与家庭故事集》。这本民间故事集对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开掘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预示着德国民俗学的诞生。

格林兄弟的影响很快波及到英国。1846年,博物学家汤姆斯提议以folklore来代替过去关于“民间古俗”的种种说法。这个自造的英文词汇不久就被英国古物学者和其他学人所接纳,并成为民俗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名称。

英国众多学者对民俗解释理论的建树,为民俗学成为国际性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缪勒、安德鲁·兰、泰勒、高谟、纳特、柯克斯和弗雷泽等等。

缪勒这位德裔语言学家提出了神话源于“语言疾病”的学说,这在当时引起了学界很大的震动。他曾经花费许多精力去追寻希腊诸神名字的印度源头,并发现这些神名最初都是对自然现象的比喻和象征。因此,他推论,神话是原始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歧义与解释,原来语言中神名的最初含义被遗忘,为了对原先的神名和神事作出合理解释,后人就创造出很多故事附会其上。

安德鲁·兰对缪勒的“语言疾病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出版了《习俗与神话》、《巫术与宗教》、《宗教的产生》等著作。随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以“文化遗留”的观点解释了活跃在现代社会古老民俗。在高谟的努力下,1878年成立了英国民俗学会。为了普及民俗学理论,高谟出版了《民俗学手册》和《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等著作。纳特则应用泰勒和安德鲁·兰的理论对大量的爱尔兰民俗进行解说。此外,柯克斯女士关于《灰姑娘》故事的传播研究,弗雷泽的《金枝》、《旧约中的民俗》等论著所表现出来的研究策略对英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民俗学在芬兰的诞生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伴相生,自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元12世纪到14世纪,芬兰被瑞典人征服,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基督教文化;1809年又被割让给俄国。这个期间,芬兰人饱受异文化的压制和摧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感到漠然和迷茫。1917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以后,芬兰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各种渠道找回民族的传统,寻找启迪民族精神的妙计良方。曾以医务官身份生活在乡村社会,亲自搜集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歌谣的隆洛德,于1835年出版了芬兰史诗《卡勒瓦拉》。该史诗对激扬芬兰人的民族精神和再现芬兰人的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史诗的问世也成为芬兰民俗学成熟的标志。

目 录

绪 论 时代呼唤民俗学	(1)
第一章 民俗与民俗学	(13)
第一节 民俗的界定	(13)
第二节 民俗学学科定位分析	(22)
第二章 民俗的本质	(36)
第一节 民俗是传统	(36)
第二节 民俗是生活	(40)
第三章 民俗象征	(47)
第一节 民俗象征释义	(47)
第二节 民俗象征的结构	(49)
第三节 中国民俗象征类型	(55)
第四章 民俗的起源与传播	(61)
第一节 民俗的起源	(61)
第二节 民俗的传播	(70)
第五章 民俗的特征与功能	(81)
第一节 民俗的特征	(81)
第二节 民俗的功能	(90)
第六章 民俗的分类	(101)
第一节 民俗的分类方法	(101)
第二节 民俗类型解析	(108)
第七章 民俗学文本	(151)
第一节 民俗学文本释义	(151)
第二节 民俗学文本类型	(154)
第八章 民俗学语境	(170)
第一节 民俗学语境释义	(170)

第二节 民俗学语境的层次·····	(173)
第三节 民俗学语境的功能·····	(184)
第九章 民俗学互文性 ·····	(192)
第一节 互文性释义·····	(192)
第二节 民俗学互文性的类型·····	(194)
第三节 民俗学互文性的功能·····	(200)
第十章 伪民俗问题 ·····	(207)
第一节 伪民俗概念及形态·····	(207)
第二节 伪民俗的文化根源·····	(214)
第十一章 民俗学田野工作 ·····	(221)
第一节 田野工作的历史·····	(222)
第二节 田野工作的操作方式·····	(227)
第三节 田野工作的过程·····	(231)
第十二章 解释民俗学方法 ·····	(242)
第一节 神话原型批评·····	(242)
第二节 传播学派·····	(245)
第三节 功能学派·····	(249)
第四节 历史地理学派·····	(254)
第五节 结构主义·····	(259)
第六节 口头程式理论·····	(265)
第七节 表演理论·····	(270)
第八节 “象征—解释”理论·····	(274)
结 语 民俗谱系解释学 ·····	(278)
主要参考文献 ·····	(292)
后 记 ·····	(295)

绪论 时代呼唤民俗学

以研究民众生活为己任的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一个世纪,但是民俗学的学科内容——民俗,则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说华夏子民诞生在地球上就出现了民俗的话,那么,在这块土地上,老百姓为了更好地生活,他们在惯例的左右下辛勤地耕耘和劳作;为了和谐、和睦相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规约生活行为和社会运转的制度;为了自由闲适地倾吐声音、抒发情感,他们不断创造着“言为心声”、“我口唱我心”的文学。这些传承于历史长河,源自于每个社会时段,发生于不同族群的民间知识汇聚成厚实、博大、严密的中华文化而光耀四射,并以其独特的功能和不朽的魅力引导着文化的创制和发展,调适着民众的生活秩序和精神世界。它们的久远、它们的鲜活,它们的广博、它们的精深,它们自由飞腾的思想、它们承传延续的结构范式,体现了炎黄子孙对生命的不懈追求和对艺术的无限创造力。这些悠悠古韵与勃勃生机交织而成的民众知识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今快速变迁的世界格局中,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发展经济和谋求进步,各国政府正在加快速度与世界同步;为了表现各自的民族个性和文化魅力,他们又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地球村里,各国政府和民众正在积极行动,他们实施的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措和举动维护了民族的根脉,唱响了民族的声音,确证了民族的身份,并以其鲜明的民族品格影响着世界。在这样一个重视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大力加强中国民俗学的建设颇为重要,也十分紧迫!

一、国际化的学科

民俗学是一门具有很强国际性的学科。它诞生于欧洲,后来逐步走向世界,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1846年,威廉·汤姆斯提出“folklore”一词之前,欧洲民俗学就已经出现。19世纪初期,处于拿破仑统治下的德国,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日渐式微。为了寻找民族的传统,唤醒民族意识和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力,当时德国

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学者大力提倡复制“祖国的古董”、挖掘“民间精神”。在这种政治形势和文化背景下,格林兄弟开始搜集民间故事,希望从民间故事里找到德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他们经过几年的搜集和加工,于1812年出版了《儿童与家庭故事集》。这本民间故事集对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开掘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预示着德国民俗学的诞生。

格林兄弟的影响很快波及到英国。1846年,博物学家汤姆斯提议以folklore来代替过去关于“民间古俗”的种种说法。这个自造的英文词汇不久就被英国古物学者和其他学人所接纳,并成为民俗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名称。

英国众多学者对民俗解释理论的建树,为民俗学成为国际性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缪勒、安德鲁·兰、泰勒、高谟、纳特、柯克斯和弗雷泽等等。

缪勒这位德裔语言学家提出了神话源于“语言疾病”的学说,这在当时引起了学界很大的震动。他曾经花费许多精力去追寻希腊诸神名字的印度源头,并发现这些神名最初都是对自然现象的比喻和象征。因此,他推论,神话是原始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歧义与解释,原来语言中神名的最初含义被遗忘,为了对原先的神名和神事作出合理解释,后人就创造出很多故事附会其上。

安德鲁·兰对缪勒的“语言疾病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出版了《习俗与神话》、《巫术与宗教》、《宗教的产生》等著作。随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以“文化遗留”的观点解释了活跃在现代社会的古老民俗。在高谟的努力下,1878年成立了英国民俗学会。为了普及民俗学理论,高谟出版了《民俗学手册》和《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等著作。纳特则应用泰勒和安德鲁·兰的理论对大量的爱尔兰民俗进行解说。此外,柯克斯女士关于《灰姑娘》故事的传播研究,弗雷泽的《金枝》、《旧约中的民俗》等论著所表现出来的研究策略对英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民俗学在芬兰的诞生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伴相生,自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元12世纪到14世纪,芬兰被瑞典人征服,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基督教文化;1809年又被割让给俄国。这个期间,芬兰人饱受异文化的压制和摧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感到漠然和迷茫。1917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以后,芬兰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各种渠道找回民族的传统,寻找启迪民族精神的妙计良方。曾以医务官身份生活在乡村社会,亲自搜集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歌谣的隆洛德,于1835年出版了芬兰史诗《卡勒瓦拉》。该史诗对激扬芬兰人的民族精神和再现芬兰人的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史诗的问世也成为芬兰民俗学成熟的标志。

相对于欧洲,美国的民俗学在 19 世纪学科发展的初创时期没有多大建树,多是模仿和吸纳英国民俗学的经验,对于本土民俗的研究意识并不明显,对于学科界域的认识也不明晰。早期美国民俗学的代表人物是柴尔德,他曾出版《英格兰与苏格兰叙事民谣》。纽厄尔在长期搜集和研究了儿童游戏后,出版了《美国儿歌与游戏》等著作。他还于 1888 年发起筹建了美国民俗学会。

在民俗学创始时期,学者们关注的民俗事象绝大部分是民众落后的文化。意大利学者科基雅拉认为,大批学者将自己的视角触及到古诗、俗语、谣谚和农民的歌谣之中,他们对当时的农民兴趣日益高涨,民俗学正是在关心“民”的基础上诞生的。民俗学的特殊问题就是界定:什么能够称“民”,什么能够称“俗”。在那个时代,农民被浪漫主义者赞美为健康素朴的古代文化的传承人,而流传于乡村社会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仪式信仰则被当作幸存的古代文明。这个时期的民俗学在对待民俗事象的问题上,深受浪漫主义思潮的鼓舞和影响,把民俗作为民族的古老文化和传统知识来看待。在民族精神沦丧的年代,人们将文化触角植根于民俗的沃野土壤中。于是,大肆对民俗进行改造和重塑,以期重建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现象成为民俗学早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到了 20 世纪初,民俗学研究在欧美等国越来越受到重视,解释民俗的理论不断深化和多样化。更为重要的是,民俗学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为民俗学开始向中国、日本等国家扩展。

在芬兰,以科隆父子为代表的民俗研究无论在理论建树上,还是在推动民俗学的普及等方面皆成绩斐然。尤利斯·科隆在赫尔辛基大学执教期间,通过比较一首民歌流传的许多异文,从母题角度将民歌的异文进行分解,并从民歌历时流变和共时存在两方面分析这些母题的分布状况和历史变迁,开启了芬兰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先声。老科隆去世后,他的儿子卡尔·科隆继续在父亲的岗位上为民俗学工作。他整理发表了他父亲晚年的重要著作,致力于发展历史地理研究方法,1926 年发表的《民俗学方法论》系统阐述了芬兰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科隆父子创造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广泛运用。卡尔·科隆还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俗档案馆,创办了著名的《世界民俗学家通讯》,并使田野工作方法在芬兰民俗学中不断制度化和规范化。

与卡尔·科隆同时代的安蒂·阿尔奈从一开始就将注意力集中在民间故事的结构分析上,他于 1910 年出版了《故事类型索引》。1927 年—1928 年经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修订之后,这本索引工具书便成为民俗学的经典,自此 AT 分类法也成为全世界民俗学者必须掌握的主要分析工具。

进入 20 世纪后,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民俗学家强调以人类学的理论研究

美国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博厄斯为美国民俗学研究另辟蹊径,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科思想危机。在人类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双重压力下,“民俗学者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确实了解到民俗之间的这些关联,但我们不知道导致这些关联的人类原动力;我们知道存在一些模式,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模式是如何被真实的人类活动创造出来的。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文化可以如何迥然相异,而存在主义哲学提醒我们必须去理解真实的、个体的人如何在真实的时刻创造历史——并非历史影响个体,而是个体创造历史”^①。

格拉西所说的人类学是指博厄斯开创的美国人类学传统,这种人类学的影响显著地表现在“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和“田野工作方法论”两个方面。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在反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也粉碎了人类文化同一性的神话,使得异文化和亚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对传统民俗学思想的冲击在于:既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现实的又是合理的,那么即便故事的一元发生论是正确的,历史地理学派通过比较大量异文来“异中求同”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

如果说传统的民俗学研究主要在于民俗的“求同”,诸如大量的民俗理论在解释民俗的相同与相似,传统的类型和母题研究追求的是民间文艺作品在具体内容上的“同”,故事形态学追求民间故事在深层结构上的“同”。对此,列维-斯特劳斯对普罗普归纳出来的故事形态带有普遍性的功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普罗普的形态学分析使得实际上只存在一个故事,人们可以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但再不能从抽象下降到具体。到了人类学学者那里,他们在追求相对主义文化观的过程中,启发民俗学者走向了“求异”的路径。为实现这个转换,田野工作方法就成为民俗学家不得不走的道路了。

汤普森在民俗学理论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发展和完善了故事分类法,为民间文学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1928年,汤普森出版了他修订的阿尔奈的《故事类型索引》,即《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32年—1937年,汤普森又发表了《民间文学母题索引》。1946年,他的《民间故事》出版,很快成为民俗学经典。可以说,这个时代的美国民俗学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众多学科的方法介入民俗学领域,使民俗学理论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出于“经世济民”、“学问救世”的目的,从“农民为什么贫困”的命题出发,不断在民间寻求答案,从而使日本民俗学

^① [美]亨利·格拉西:《美国民俗学的昨天与今天》,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0日。

发展成为一门学问。当时他出版了《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阐明了民俗学的对象、目的和方法，代表着学术发展的主流，以致后来人们一直将日本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

柳田国男将民俗学对象锁定在“民间传承”上，他把这些不受文字影响保留下来的古有生活方式、劳作方式及思考方式的民间传承与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中央表层文化区别开来，而且认为不受中央表层文化影响的乡土民间传承孕育着日本文化的本质。正是柳田国男通过提倡乡土研究应以“民间传承”为对象，从而将民俗学定位为一门如何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人的学问。他将“一国民俗学”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从此，日本的民俗学科之中一直存在着强烈的一国民俗的内向倾向。

“柳田民俗学”作为相当一段时期日本民俗学的代名词，反映了柳田国男在日本民俗学界的崇高地位，他提出的“重出立证法”和“方言周圈论”引导了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潮流。

20 世纪后 50 年，是国际民俗学交流频繁的时代，是各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理论建树多元化的时期。同时，跨国、跨境民俗研究不断发展，形成了国际比较民俗学的全新局面。

美国民俗学在理查德·多尔逊的努力下逐渐摆脱人类学和欧洲民俗学的影响，成为当今世界民俗学中最为活跃也最有实力的一支队伍。多尔逊出版了《美国民俗学》、《美国地方民俗》、《美国民俗与历史学家》等著作。他还努力发展“新大陆民俗理论”，认为美洲各国民俗皆产生于多种族、多文化的互动过程之中，在此基础上应该有自己的民俗学理论，而不能生搬硬套欧洲民俗学理论。

阿兰·邓迪斯、丹·本-阿莫斯等一批学者的崛起，标志着美国民俗学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各派争雄的新阶段。美国民俗学的研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固定在口头创作、社会生活习俗、物质文化和民间艺术四个主要领域，每个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日本民俗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化为三种学科，即民俗学、民艺学和民具学，它的分类变得相当细致。这种细致的分类反映了日本民俗学研究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入的态势。

这个时期，民俗学在发展中暴露出学科本身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民俗学对象和范围的广狭之争，以及与此相关的和人类学或民族学、社会学的学科分野，尤其是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研究的主客体问题显得相当突出。甚至到了 20 世纪末，在反思民俗学的议论中，把民俗学纳入到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畴，这样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取向还十分明显。从美国到欧洲、到东亚诸国，对民俗学学

科的独立存在发生动摇的学术情绪正在滋长和蔓延,不少民俗学者已经或正在公开转向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末期,民俗学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阔,民俗学看问题的视点越来越新颖独到、精微细致。国际民俗学展示的新的民俗学研究议题、知识表述、语言、概念、理论、分析工具和思辨理路等,使我们更为清晰地意识到民俗学已经在传统学科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发展。

比如,现代民俗学重视文化的空间性和文化的时间性就较之传统民俗学有所不同。传统的民俗研究强调文化传统的代代相传和文化的时间性,而不是空间性。作为物质实体的空间和作为关系的空间,现代民俗学乐意将空间的关系看成是社会关系,而非几何和拓扑关系,将空间的科学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这样一种取自文化分析视角的空间概念,倡导空间本身的生产而不是空间中的事象的罗列。

在对待时间、过去和历史方面,传统民俗学更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漫长演化,而现代民俗学则强调文化的空间性作用所导致的快速变化,以及“时间—空间”的二律背反,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民俗学更像传统历史学,现代民俗学更像民俗学。在全球化导致的“时空压缩”体验以及“流动空间”的环境中,强调的是即时生产体系,同时性与无时间之时间的效果,以及对历史和过去的怀旧和乡愁,以便将快速的时间体验慢下来,通过时间策略寻求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在空间转向的喧嚣中,重写时间民俗学,关注时间的空间表现与历史的终结以及地方在流动空间中的废弃,“时间—空间”问题再度成为民俗学转向后民俗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传统民俗学关注人对地方的体验所形成的地方感,强调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现代民俗学关注现代性所造成的空间与地方的同质化趋势,运用“无地方性”和非地方概念构成与“地方性”概念相对的两极体验,从而发出保护和拯救地方性、传统和本真性,塑造地方和传播地方形象的呼吁,反映出民俗学对地方特征和空间差异价值的认同。

现代民俗学将地方作为区位,即地方所在的地理空间关系、场所、地方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脉及地方感的综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地方感”改造为“地方认同”,从而将民俗学引入当代学术对于各种身份的讨论中。关注地方的区域研究即“地域体”研究,已被发展为新的民俗学研究方向,它超越了传统方志学和民俗学关注空间和地域体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人类空间、地方体验和时空压缩造成的两极分化,关注媒体在社会共同体想象和地方感中塑造的巨大作用。

民俗学经过了 160 年的发展,学术取向在社会思潮和多学科的参与下几经转变,但民俗学的核心问题一直没有改变,民俗研究最强大的力量也没有改变,那就是通过其表达文化,长久地把握人类深深地企盼和恐惧的脉搏^①。

二、学科的本土化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紧密纠结在一起。起初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是民族自救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中指出:“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晚清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足迹已经到达了亚洲和非洲等许多国家,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在动荡,它激发了彼此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梁启超、严复、黄遵宪、鲁迅等有识之士,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在知识上学贯中西,但在实践上却强调西学中用,服务于本民族的国家社会的改造。为此,他们对于民俗也有了比过去时代不同的看法,如黄遵宪对于一般民俗的看法、鲁迅先生对于神话的看法等。他们发现,民俗在保持和兴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大力提倡的新思潮、新文化里面的一个‘新’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他们当时阐释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鉴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启蒙学说,显示了近代学术的性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和春秋时代一样,是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时期的产物。当然,在性质上,两者又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晚清时期的民俗学,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接续的,它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②

当时,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周作人、鲁迅、章太炎等人相继把“神话”作为启迪民智的新工具引入文学、历史领域,用以探讨民族之起源、文学之开端、历史之原貌。晚清末年的章炳麟、刘师培、黄节等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感生神话和图腾主义的研究和阐释,除了对民俗学、神话学等学术思想有推进外,还用来从政治上指斥异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晚清时期,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学者,虽然他们不是专门从事民俗学的研究者,虽然他们均是张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服务,但他们关注着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这在客观上直接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根基。在早期研究者看来,民俗学正可以肩负启迪民众、唤醒民心的重

^① [美]瑞吉拉·本迪克斯:《探求本真性:民俗研究的形成·绪论》,李扬译,李扬译著:《西方民俗学译论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②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任,其中蕴涵着反对封建上层文化的潜力。

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京大学日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谣。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创办《歌谣》周刊,共出版了97期,后并入《国学门周刊》(后再改为月刊)。出于工作的需要,北京大学还相继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北京大学学者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先进的思想,“发现”了民俗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这在1922年12月17日的《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就有明确的表述: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份的力,至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与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的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学术目的在于发掘民众的精神,文艺的目的则是通过歌谣发现国民的心声,学者的诉求显然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想运动息息相关。

中国民俗学的诞生与借鉴西方民俗学理论以及接受西方民俗学意识的浸染紧密关联。周作人曾说:“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我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①周作人介绍了日本和西方许多重要的民俗学思想,为当时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常惠学法文出身,他在歌谣学运动中表现特别积极,曾是编辑《歌谣》周刊的中坚力量,被胡适戏称为“研究歌谣的‘老祖宗’”。常惠赞同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歌谣,董作宾关于《看见她》的著名文章就是在他的启发下写就的。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诞生的中国民俗学,虽然滥觞于晚清近20年间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它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依相生,对抨击和对抗封建思想、拯

^① 周作人:《周作人自述》,载《燕大月刊》,1930年第1期。

救人的灵魂起着重要作用。

1927年11月,顾颉刚与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年,推举容肇祖担任民俗学会主席。1933年,民俗学会开始广泛征集民俗学的资料。这一时期,许多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切入到民俗研究中来,如顾颉刚就是从改造史学的角度进入民俗学大门的。他在研究中突然发现,“这种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①。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和妙峰山的考察,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标志性的成果。

这期间,各地民俗学组织很多,先后以广州中山大学和杭州为中心。此时,中国民俗学运动在南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1942年,在解放区,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学习人民的思想,包括学习老百姓“萌芽状态的文艺”。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民俗学紧密服务于政治,服务于人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采风活动,截止“文化大革命”之前,共出版了民间文学集2400多种,还编印了大量的内部资料。尽管在此期间,民俗学主要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并且受到严重的“左”的思想的错误干扰,但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许多宝贵的民俗学材料逐渐披露于世。比如《格萨尔》、《玛纳斯》和《江格尔》三大英雄史诗,西南民族的创世史诗群,还有《嘎达梅林》、《阿诗玛》、《阿凡提的故事》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民俗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民俗学的认识,也使中国民俗学的丰富资源令世界刮目相看。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广泛展开了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俗作为辨识民族身份和建构民族历史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

在这个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材料的搜集与发掘上。由于这种搜集与发掘同民族运动和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因而民俗资料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改造,自然限制了民俗学学科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以后,新老民俗学工作者为开展民俗学活动积极呼吁。1978年秋,钟敬文、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联名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递交了关于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倡议书,1979年第12期《民间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3年5月,全国性的民

^① 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俗学组织——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选出了以钟敬文为理事长的领导班子。至今,中国民俗学会已举办了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达2000多人,遍布全国各地,现任理事长为刘魁立。

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民俗调查,最突出的成绩表现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民俗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中国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及各有关专题论著等相继出版。设在北京的中国民俗学会成为全国民俗学活动的中心。

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历了从研究主体的全体民族到劳动人民,再到民众的过程,无论学者们怎样解释劳动人民、人民和民众,都丝毫不能动摇民俗学所反映的民族主义觉醒和强烈的政治文化倾向;研究内容从“五四”时期关注民间歌谣到30年代的民间文艺、40年代的解放区劳动人民的文艺、50年代的民间文学和民间风俗,再到80年代以后的民俗;研究规模从零散的个人爱好到学者们自觉发起的民间组织,再到政府大规模的文化运动和高等院校有明确户籍的研究队伍,这些都深刻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走过的漫长而短暂、艰辛而光辉的旅程。

今天,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已经融入到了世界民俗学的浪潮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思想不断涌入,新的观念不断冲击,大大加速了中国民俗学理论上的吐故纳新。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民俗学遗产的延续与断裂正成为世界性的民俗问题,民俗学领域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和范式转型。

三、时代呼唤民俗学

我们的先祖在拓荒神州大地的时候,留给我们太多的财富、太多的自豪:四大发明的智慧、万里长城的壮阔、汉唐盛世的辉煌,让炎黄子孙无比骄傲;沸腾的庙会、庄严的节日庆典、民间文艺的展演、生活习俗的惯制等,寄寓着老百姓丰富的精神财富;深藏在人们记忆之中的吃年夜饭、包粽子、唱大戏、舞龙灯让人魂牵梦绕,久久不能释怀。这些世代传承的民俗,汇聚成民族生存的血脉,成为深植于泥土中的民族的根,传衍成民族的身份、文明的渊薮。然而,现代化的浪潮对传统社会和文化传统发起了剧烈冲击,一个又一个民间艺人相继离去,一批又一批民间艺术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无数伴随祖先走过沧桑的民俗也大都悄无声息地烟消云散了。我们不得不正视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和民俗传统正面临着日渐式微的令人堪忧的境况。我们在焦虑,如果祖先创制的传统传承到我们的手里断裂了,我们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吗?我们在期待,期待着我们的